

# 政治学研究要融入强起来的时代洪流

周光辉

政治学是治国安邦之学，与一个国家的建设、发展密切相关。国家建设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深厚的实践基础，政治学研究为国家发展提供政治理论支持。国家建设与政治学研究良性互动，能够助推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交汇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学术支撑，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和勇于承担的历史责任。

## 回应新的时代要求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讲，政治就是设定国家机构及其职权，管理和参与国家事务，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因此，政治学是以国家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如国家权力、国家职能、国家机构、国家结构、国家利益、国家治理、国家能力等。尽管随着时代变迁，政治学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但国家建设与发展始终是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课题。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制度前提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政治前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特的国情和道路选择，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又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和伟大成功，既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更无法用西方政治学理论来解释。而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还会遇到各种复杂问题。如何在理论上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有效化解未来发展面临的风险，增强发展动力，迫切需要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这是时代对中国政治学研究提出的要求。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政治学如果不能回应时代要求，不能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变革作出科学解释，不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学术支撑，那么，政治学自身的知识价值和

学科地位就无法得到承认，中国发展道路的正正当性和合理性也会缺失政治学理论上的阐释，结果很可能是中国政治学在实践中失语，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会受到削弱。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学人应自觉承担起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努力通过知识生产和思想创新，为中国强起来提供政治学上的有力支持。

## 为强起来提供学术支撑

根据知识的特点，政治学生产的知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性知识，包括陈述性知识和规范性知识；另一类是实践性知识，包括程序性知识和对策性知识。从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这两种类型看，政治学可以在理论建构、制度设计、政策咨询三个层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支撑。

当今时代，政治学要有所建树，就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支撑。从解释理论的角度说，当代中国政治学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出科学阐释。这种阐释不能仅限于对事实和现象的简单描述，也不能单纯停留在讲好中国故事层面，而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进行归纳总结，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从人类的认识规律看，概念往往先于理解存在。对于一个复杂现象如果没有形成概念，这种现象就无法更好地被人所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只有经过概念化提炼和理论确认，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事实和规律才能转化为一般性、普遍性的知识，从而更好地被人们所理解、被国际社会所承认。从规范理论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并不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重复，而是一种新探索。这种新探索需要理论上的确认和指引，在这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大有可为。比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建构，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内在机理和实现形式进行学理论证，对人们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要求在理论上予以回应，等等。这些理论建构需要吸纳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更要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归纳。

制度以规范形式为人类行为提供约束和激励，从而使人类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任意性的支配，建立起有序的社会生活。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供给，国家的持续发展就没有保障。从知识角度讲，制度设计蕴含着程序性知识，形式化的制度是程序性知识的表征。这类程序性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上指导着人类的实践活动，为人们解决“如何做”的问题提供参考答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也为国家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保障。如何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补齐制度短板，需要政治学深入研究，拿出有说服力的学术成果。

政策咨询是指通过专家或智库所掌握、储备的知识和数据，对各种信息进行综合性研究开发，并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政策性建议的活动。通过科学决策来保证公共政策的合理性、科学性、有效性十分重要。现代社会高度复杂，信息量大，社会关系多变，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多方咨询意见，以避免决策失误。政治学可以发挥其实证、量化分析的优势，从多方面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比如，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关问题、现象、事态情况的综合分析报告；对全局性、长期性问题进行超前研究，做出科学预测，并提出战略性建议；为政府决策机构解决某类问题设计若干可行方案；分析决策实施条件、成本、有利和不利因素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提出可供选择的实施方案；对政府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为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和追踪决策提供帮助。

政策咨询是指通过专家或智库所掌握、储备的知识和数据，对各种信息进行综合性研究开发，并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政策性建议的活动。通过科学决策来保证公共政策的合理性、科学性、有效性十分重要。现代社会高度复杂，信息量大，社会关系多变，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多方咨询意见，以避免决策失误。政治学可以发挥其实证、量化分析的优势，从多方面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比如，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关问题、现象、事态情况的综合分析报告；对全局性、长期性问题进行超前研究，做出科学预测，并提出战略性建议；为政府决策机构解决某类问题设计若干可行方案；分析决策实施条件、成本、有利和不利因素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提出可供选择的实施方案；对政府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为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和追踪决策提供帮助。

中国政治学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学术支撑，不仅需要理论勇气和学术抱负，更重要的是脚踏实地，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进行长期不懈努力。站在为国家强起来提供有力学术支撑的战略高度，中国政治学应增强学术自主性，提高学术研究科学化水平，拓展学术研究视野，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取得新进展。

## 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

中国政治学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学术支撑，不仅需要理论勇气和学术抱负，更重要的是脚踏实地，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进行长期不懈努力。站在为国家强起来提供有力学术支撑的战略高度，中国政治学应增强学术自主性，提高学术研究科学化水平，拓展学术研究视野，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取得新进展。

中国政治学应立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开展原创性研究。主张学术自主性和立足中国

现实，不是要自我封闭，更不是否认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是强调中国政治学要回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不能从西方理论出发，不应局限于西方理论中固有的概念和观点，更不能不加辨析地将西方政治学学术议题转化为中国的学术议题。学术的生命力源于实践。中国政治学要真正走出单纯引进、介绍西方政治学的阶段，深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从生动鲜活的政治运行中发现问题并提炼出学术议题，通过原创性研究实现理论创新，着力解决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中国政治学研究须着重关注。这其中有一些社会现象需要精确地定量描述，许多政策性问题需要精细化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因此，实证研究也是中国政治学应注重的角度和方法。通过定量分析，确定社会现象中有关因素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和数量关系，提升社会现象分析的精细化和准确化程度，从而提高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政治学研究应以问题为导向，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决定采取何种研究方式和方法。跨学科研究和比较研究是拓展政治学研究视野的两种有效方法。要对一些重大问题整合研究，就要超越学科界限，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进行跨学科合作，从多维度、多层次展开研究，提升研究的实际效果。同样，开展比较研究有助于获得新的学术成果，而且也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关依据。为使决策科学、合理，可以将相关事物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分析异同、优劣，从而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符合事物的规律和实际。需要强调的是，研究中国问题不能把研究视野局限于中国范围，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政治学应加强国际比较研究，不仅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也要注重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更好地认识中国，通过解决中国问题进而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

(作者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题图制作：沈亦伶



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也因此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和学术。如果套用西方概念和学说来讨论中国的事情，往往隔靴搔痒、说不清楚，甚至出现误读。

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西方关注的视角也有很大差异。对此，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提出西方学者比较关心“政体”问题，而中国很多学者则关心“政道”问题。西方不少学者认为政治生活中“政体”是最重要的，因而重点讨论权力怎样产生、分配和制约，喜欢用民主与专制对立的框架进行分析。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历史上讨论“政体”问题的思想者为数不多。中国传统思想家对“政道”更为津津乐道，常用国有道、君有道、政不得其道等方式进行表述。“政道”问题关注的重点是治国的理念和目标，就是考察治理的实际效果。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道”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无论儒家、道家、墨家，都有很多代表性人物来讨论“政道”。他们从实现治理目标、达到良好治理效果的角度出发，探索治国的理念和模式，评价当时社会治理的实际情况。至于具体的治理方法，一般则会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进行选择。比如有的时候强调法治，有的时候强调无为而治，等等。在中国漫长历史发展中，更是形成礼法合治的智慧。

这种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可能与中国的国家规模一直比较大有关。在疆域广阔、各地差别明显的情况下，国家治理并不拘泥于某种特定“政体”模式，而是把重点放在执政所要达到的目标上，并围绕这个目标形成相应制度安排。

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按照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形成了一整套国家治理的理念，比如仁政、德治等。与之相适应，再设计比较有效的治理体制机制，比如科举、官僚等级制度等。虽然随着历史发展，这些理念和制度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政治思想注重把“政道”先搞清楚，然后从“政道”出发来探索具体制度，而不是相反。

中西方不同的政治观念也表现在对民主的理解上。按照西方政治学观点，民主被理解为某种程序民主，实践中表现为一种多党制下的政党竞选制度。民主成为一套制度性程序，一种选择执政力量的方法。而中国则更为关注实质民主。所谓实质民主，就是首先看这种民主能否最大程度地反映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能否使国家长治久安，真正实现良政善治。良政善治的追求是“政道”传统的一种体现。

邓小平同志曾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这里把人民团结和人民生活改善均作为评价标准。按照这样的标准，西方国家的民主质量不容乐观。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民众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出现分裂与冲突。这说明西方民主政治运行出现了问题。那些学习了西方民主的“颜色革命”国家，它们的民主制度质量也很糟糕，国家政局持续动荡，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其中一些国家甚至陷入了全面内战、分崩离析的悲惨境地。

从实质民主、良政善治的目标出发，探索民主的实现形式和程序，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一种智慧。中国强调实质民主，大胆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也可以说是这种政治思想传统的体现。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制度保证，也将丰富世界政治文明形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总之，中国人秉持实事求是理念，强调从内容与结果的结合上来讨论治理问题，从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良政善治来判断一种政治制度的质量，这对于片面强调形式和程序正确的西方政治话语来说是一种范式转变。至今还有西方政治学者认为形式正义就会自动产生实质正义，形式民主就等于实质民主，这并不符合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中国的政治思想认为实现民主的途径应由不同国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探索，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政治分成两大类，那么，良政与劣政可能是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分类。“政道”思想体现了中国人考察政治运行的智慧，在今天的政治学研究中仍然具有价值，中国人应该也能够为人类制度文明进步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 中国政治思想的政道传统

张维为

## 改革深入与学术进步相互激荡

# 治理实践发展呼唤研究方法创新

张小劲 孟天广



党的十九大提出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为我们描摹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动人图景。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需要前所未有的哲学社会科学来支持，这是时代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呼唤。面对这种责任、这种呼唤，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予以远大抱负、强烈担当和不断创新予以回应。

作为专门研究国家政治现象的学科，政治学是受国家政治影响较深的学科门类，也应对国家政治生活深切关注的学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政治学者更应牢记让国家强起来的使命，将学术追求和终极关怀指向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中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也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转型，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中国改革发展的宏大历史进程，为回应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诸多关键性课题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极其独特的社会实验场景，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转型与现代化同时进行、快速城镇化和大规模减贫等。与之相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也获得长足发展。依靠近40年的知识积累和不断壮大的学者队伍，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正在积极且富有成效地参与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伟大进程中。这个进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与中国学术的巨大进步相互激荡的过程，也是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成熟、发挥贡献、占据前沿的过程。

学科知识的更新、实践经验的积累，会带来知识范式的创新转换。受其影响，政治学的核心假设、研究方法和学术思路也会发生变化。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试点探索和政策实验的方法得到多次应用。从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自主创新到顶层设计之下的政策试点、布局试点和授权试点，这些模式均为中国的发展实践提供了宜时宜地的、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同时，政治学

研究也在为整体制度创设和改革创新提供思路和解决方案。当前，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变迁加速，“互联网+”、人工智能、信息化和智慧城市建设与政策实验、体制机制创新相互交织。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创新，在更深层次上推动政治学的创新发展，也呼唤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突破创新。

在当代政治学的发展中，新的研究方法层出不穷。这其中，实验社会科学和计算社会科学及其分支——实验政治学和计算政治学正在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实验政治学研究不仅借鉴自然科学中久已确立的实验思维，而且继承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中广为应用的实验技术，结合了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实验方法，涉及政治经济、政治行为、决策论、博弈论、管理科学、传播学等多个研究领域。经过一定时期发展，实验政治学经历了从观测研究到实验研究，从描述研究到因果研究，从单纯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到更加复杂的田野实验和自然实验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一套系统、高效、理性的方法体系。实验政治学的重点在于通过模拟政治行为主体的决策情景、制度环境、理性偏好

和互动模式来弄清特定政治态度、政治行为模式和政治决定倾向。

计算政治学则立足于政治学长久以来的计算传统以及相应的知识积累，并汲取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方法。当前，计算政治学受益于大数据技术，尝试把海量数据的技术方法与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将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云计算和可视化应用于现实政治问题研究。目前已经有不少政治学者将数据整理和预测分析方法应用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全球治理等问题的研究，着力探讨回应型政府、智慧型社会、自主型公民等治理问题。

未来，中国的政治学者还应继续在回应现实问题中推动政治学研究创新。一方面，基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实际进程，拓展应用和创新学科知识范畴、研究方法和技术，形成基于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新路径、新理论与新方法，从而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不断产出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积极关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解决国家治理的重大问题提供智力支持，为中国发展进步提供新知识、新思维，为全球治理创新提供中国方案。(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 回应中国自己的时代课题

——“中国政治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学术论坛述要

施今

天津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政治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学术论坛日前在天津市举行。与会者围绕构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推动中国政治学繁荣发展进行了讨论。

与会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这一历程也是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与发展的历程。在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引进的西方政治学理论观点，与中国实际有许多不兼容的地方。如何解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实践，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和使命，也给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契